

《中國學報》29期，韓國中國學會  
漢城，1989.6

## 『史記』的 特質

阮 芝 生\*

### <目 次>

- 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一. 前 言       | 四. 百王大法 |
| 二. 論治的傳統     | 五. 結 論  |
| 三. 好學深思，心知其意 |         |

### 一. 前 言

史記不是中國最早的史書，但却是最著名的一部史書。這部被譽為「史家之絕唱」<sup>1)</sup>的史書，不但在中國，「二千年來學者，家弦戶誦，形成國民常識之一部」<sup>2)</sup>，而且隨着東西文化的交流，逐漸流傳到東西甚至世界，受到廣大讀者的讚賞。史記一書之所以受到如此長久而普遍的喜愛，主要是因為書中記載的故事極其動人，而司馬遷(145~86? B.C.)的文章又極其優美；二者相加，遂產生極大的魅力。然而，史公傾其一生之力所成就的史記，其目的並非只是要為後人留下可歌泣的故事，以及提供令人擊節稱賞的文章。歷史中充滿了故事，動人的故事，所在多有；江山代有才人，美妙的文章，何代無之。這位「自請宮刑」<sup>3)</sup>的史家的椎心泣血之作，實更有其莊嚴而深遠的用意。

一般講史記在中國古代學術史上的地位，總不外以下兩點：(一)正史鼻祖。史記是「紀傳體」，乃中國第一部有組織、有方法、有宗旨的歷史著作，以後歷朝的「正史」寫作基本上都沿襲它。(二)散文大宗。中國的文學分韻文與散文兩大系統，史記的散文「雄深雅健」<sup>4)</sup>，對唐宋以迄清末之文學產生極大之影響。史學名作通常也是文學名作，中外皆然，史記更是範例。故中國大學中的歷史系與中文系，一般都同時開設「史記」的課程。然而，史記的價值不僅在於「正史鼻祖」與「散文大宗」，它的最大價值同時也是它的特殊性質乃在於它是(三)百王大法。

史書上記載的人事，多少都具有一些鑒戒作用，史家寫史，多少也都會有些個人的批評意見。但那並不等於「百王大法」。這裏所說的「百王大法」，不是指普通自然產生的鑒戒作用或批評意

\* 臺灣大學

1) 魯迅說史記是「史家之絕唱，無韻之離騷。」見氏著「漢文學史綱要」。

2) 梁啟超語，轉引自史次耘「司馬遷與史記」(廣文，1964)，p.2。

3) 司馬遷被判的是「誣罔」死刑(方士樂大以「誣罔」罪腰斬)，他自請宮刑以贖死。詳拙著「司馬遷的心」(台大文史哲學報 23, 1974)。

4) 見辛棄疾「沁園春、靈山齊庵賦」。

見；而是指司馬遷在洞察古今二千年中人事的盛衰、存亡、成敗、得失之後，秉持先秦學術的大傳統，懷抱個人的深心宏識，在歷史寫作中有意無意地為現在以迄未來的政治領導人（或有志於成為政治領導人者）提供一些最高的政治原理與準則（大經大法）。史記不僅是「一代良史」，實為「百王大法」，這話清朝的包世臣曾經說過<sup>5)</sup>，但只是一句話，從未引起注意，以致現今講史記者似乎皆未提及，大約不是不知便是不信了。這實是史記的不幸。以下謹就個人知見所及，針對此點試加論述，並就教於高明。

## 二. 論治的傳統

史記是「百王大法」不應只是一句空話。它的思想應有來歷，並且在史記書中應有具體的呈現，無論其為顯見或是含蓄委婉。首先考察中國古代學術中論治的傳統。中國古代學術演變的大勢為由王官學至百家言。王者「設官分職」，由世官、世業而形成世學，此學在官府，具有政治性，固不待言；即百家言，亦復如是。諸子百家雖衆，最要者有六家，此由司馬談首先提出。他有「論六家要旨」一文，開頭即引易大傳（即繫辭傳）「天下一致而百慮，同歸而殊塗」之語，並說：「夫陰陽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德，此務為治者也。直所從言之異路，有省不省耳。」<sup>6)</sup> 司馬談於百家中選出六家，六家名目不同，是其異處；而異中有同者，此即六家皆從事於治道與治術的講求，希望把國家社會治理得和平安穩。只不過各家所講的理路不同，各有善有不善而已。<sup>7)</sup> 就其「從言異路」而言，是「殊塗」「百慮」；但從其「務為治者」而言，則是「一致」「同歸」了。可見先秦主要六家學術的共同點，是要論治、求治。此非馬談一人之私言，淮南子亦云：「百家殊業，而皆務于治。」<sup>8)</sup> 見解正同，範圍更廣。

馬談之後，漢書藝文志舉十家，並謂「其可觀者九家而已。」（去小說家）此九家，「皆起于王道既微，諸侯力政，時君世主，好惡殊方。是以九家之術，讖出並作，各引一端，崇其所善，以此馳說，取合諸侯。」<sup>9)</sup> 此言九家道術不同，「各引一端，崇其所善」即「從言異路」；「以此馳說，取合諸侯」亦即「皆務于治」。「九家」比「六家」多出縱橫、雜、農三家。司馬談「但舉六家者，縱橫起于六國，雜家出于秦漢，農則無甚當于治道，故皆存而不論。」<sup>10)</sup> 簡言之，其重要性都不能與馬談所舉的六家相提並論。六家之中，又以儒道二家為主。馬談論六家學術各有長短，惟獨道家有長無短，且著墨獨多，並取與儒家相較，最為推崇道家。史公幼承庭訓，自是深曉道

5) 見包世臣「藝舟雙楫」、讀史記六國年表叙（安吳四種）。

6) 以上引文俱見「太史公自序」。

7) 「有省不省耳」之「省」字，宜作「善」解。詩皇矣「帝省其山」，禮記大傳「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」，箋註皆訓「省」為「善」。「有省有不省」，即有的地方講得好，有的地方講得不好，亦即各有長短。

8) 見淮南子、汜論篇。

9) 見漢書藝文志、諸子略。

10) 吳忠匡編注「史記太史公自序序說會纂」，p.20（黑龍江人民出版社，1985.12）。

家之學，史記中亦可看出受道家思想影響之處。但司馬遷父子異學，史公最推崇的是孔子，而非老子。故孔子獨列世家，稱「至聖」；而老子與申韓同傳，稱「隱君子」而已。

儒家最重要的典籍是六藝，詩、書、禮、樂、易、春秋。史記中有兩段文字特別講到六藝：

- (1) 孔子曰：六藝於治一也。禮以節人，樂以發和，書以道事，詩以達意，易以神化，春秋以道義。(滑稽列傳)
- (2) (余聞董生曰)：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，下辨人事之紀，別嫌疑、明是非、定猶豫、善善惡惡，賢賢賤不肖，存亡國，繼絕世，補敝起廢，王道之大者也。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，故長於變；禮經紀人倫，故長於行；書記先王之事，故長於政；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，故長於風；樂樂所以立，故長於和；春秋辯是非，故長於治人。是故，禮以節人，樂以發和，書以道事，詩以達意，易以道化，春秋以道義。撥亂世反之正，莫近於春秋。(太史公自序)

合此兩段文字可知 (一) 六藝的形式與功能有不同。禮是用來節制人的欲望與行為。(禮主分別，故講親疏等差，等級制度之根據亦在此。) 樂是用來增進發揚人與人之間的和諧。(樂主和合，故獨樂樂不如眾樂樂。) 書是用來傳述歷史上重要的人事經驗以為後人的鑒戒。詩是用來表達人們心中的思想感情以及民意。易是用來說明推測宇宙以及人間事物的變化。春秋是用來辨別是非，建立人間的義理。(此義理甚多，「其旨數千」，故王船山稱春秋為「義海」<sup>11)</sup>) (二) 六藝於治一也。六藝的形式與功能雖有不同，但有大同處，即六藝都具備政治的功能，六藝的義理皆有關於治道，一致而不可分割。(三) 六藝固然都與帝道有關，但以「書」與「春秋」為甚，尤其是春秋。因為春秋「長於治人」，可以「撥亂反正」。

司馬遷受父命而作史記，他自述：『先人有言：「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，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，有能紹明世、正易傳、繼春秋、本詩書禮樂之際？」意在斯乎！意在斯乎！小子何敢讓焉。』易、春秋合詩、書、禮、樂，正是六藝。可見他所當仁不讓的，乃在欲據六藝的思想以從事著述，尤其明言要「繼春秋」，即那部「長於治人」的春秋。由此觀之，史記一書亦欲論治，豈非不言可喻。

春秋是怎樣的一部書？春秋是孔子六十九歲返魯之後所作；也就是孔子不能行道於天下之後，為了讓後世的人能夠了解他的理想與抱負並繼起奮鬪而作的書。所以，春秋不只是單純的史書，而是孔子政治思想寄託之所在。孔子之作春秋，主要是筆削「魯春秋」而賦予微言大義。韓宣子適魯，見易象與魯春秋時曾說：「吾乃今知周之所以王也。」<sup>12)</sup> 可見魯春秋已是有義，可以看出一些周人王天下的道理。孔子修春秋更重「義」，「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。」<sup>13)</sup> 行事不是重點，「王心」才是重點。所謂其事則齊桓、晉文，其文則史，「其義則丘竊取之矣。」<sup>14)</sup> 最重要的是「義」。春秋言「況」(比喻)，孔子作春秋，主要是借春秋時代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來講三世(據

11) 王船山，「春秋家說」，卷二下/p.24。

12) 見左傳、昭公二年傳。

13) 見董仲舒「春秋繁露、俞序」引孔子語。

14) 孟子、離婁下。

亂世→升平世→太平世)人羣進化的治道與治法。簡言之，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是「立一王之法」。「一王之法」是本，「撥亂反正」是用，有本才有用。「立一王之法」是公羊家最簡捷的講法，孟子謂之「天子之事」，史記說是「當一王之法」<sup>15)</sup>，都是一個意思。孔子以春秋當新王，故「春秋之道」雖是通三世人羣進化之治道，而「春秋之法」則為繼周新王之法以待後王繼起師法之法。「立一王之法」者，實欲以為萬王之法鑒也。<sup>16)</sup>

六家皆務為治，六藝於治為一，六藝中的春秋又「當一王之法」，可為萬王之法鑒。那麼，本此先秦學術舊統（論治的傳統）並欲繼此「一王之法」之春秋而作的史記，它之成為「百王大法」，從學術淵源來看應是不難理解的事。

### 三. 好學深思，心知其意

史記若為「百王大法」，則司馬遷論治的思想應在全書中隨處可見，要在讀者「好學深思，心知其意」<sup>17)</sup>而已。史記首本紀，本紀是以宰制天下者為中心，按照時間的順序歷記各朝的盛衰興亡以及各種重要的人事活動。但司馬遷寫史記並不僅是在作客觀的歷史敘述，他在歷史敘述中用各種方式加入了他個人的思想見解。例如，本紀首五帝，五帝本紀最特別的地方是「見其治未見其亂，見其盛未見其衰。」<sup>18)</sup>歷史的本質是變化，怎麼可能只治不亂，只盛不衰呢？中國三代以下的歷史不是如此，中國以外其他地區人類的歷史也不是如此，而司馬遷寫五帝如此。唯一可能的解釋是，治亂盛衰與統治者本身的好壞有密切的關係，而五帝個個都是好帝王。所以五帝本紀「全講五帝德」<sup>19)</sup>篇中除了敘述天地山川、歲時日月、禮樂制度、設官分職等經世大典外，主要講五帝的性行德業。司馬遷寫五帝，皆聖德淵懿，仁民愛物，舉賢懲凶，化育天下，協和萬國，足為後世政教的典範。史公開篇首重帝「德」，不論是否溢美，他寫史是有深心的。五帝本紀後，夏本紀主述禹之明德，至末代夏桀「不務德」，而「湯修德」<sup>20)</sup>，才代夏有天下。殷本紀寫殷五盛五衰，也都與人君修德用賢與否，有直接的關聯。周本紀篇幅較長，前半截詳西周所由盛，在於效法先祖、世德相承；後半截詳東周所由衰，在於與周家舊德背反。此外，史公在周本紀中不厭其煩地抄錄了祭公諫穆王征犬戎，芮良夫論榮夷公專利，召穆公諫厲王弭謗以及甫刑之哀矜惻怛諸文，固然是盛陳周德，更有為後世法的用意。三代之後為秦，秦本紀與秦始皇本紀寫秦先祖以養馬起家，而後逐漸壯大，由初盛、二盛以至十盛（稱皇帝），然後盛極而衰。史公既原始察終，見盛觀衰，論考之行事，最後又「稽其興壞成敗之紀（理）」<sup>21)</sup>，引賈誼「過秦論」斷其敗亡之故

15) 「太史公自序」、壺遂語。

16) 參拙著「從公羊學論春秋的性質」，pp.61-64（台大文史叢刊 23, 1969）。

17) 「史記、五帝本紀」贊語。

18) 牛運震評語，「史記評註」卷一/p.4（空山堂藏板）。

19) 同上。

20) 見夏本紀。

21) 見司馬遷「報任安書」，漢書「紀」作「理」。

爲「仁義不施，而攻守之勢異也。」<sup>22)</sup> 秦之興亡始末，足爲萬世炯戒，史公心中實有此意。

史記欲繼春秋，春秋從魯隱公讓國講起。相傳孔子不但作春秋，也刪尚書，而尚書從堯舜禪讓開始。史公受此思想影響，所以他寫史記，列傳首伯夷，世家首吳太伯，也都因爲是讓國的緣故。史記崇讓，不僅以上二例。本紀首五帝，五帝本紀之主要內容即是堯舜禪讓，敘目中也特別提到：「唐堯遜位，虞舜不台。」<sup>23)</sup> 可見也有貴讓崇德之意。十表首三代，三代世表記載的第一件事爲「帝啓伐有扈，作甘誓。」帝啓爲何要伐有扈？因爲「有扈氏不服」。有扈氏爲何不服？因爲帝啓父死子繼爲家天下之始，與堯舜禪讓不同。啓伐有扈，大戰于甘，其戰前誓師之辭爲「甘誓」。徐克范曰：『夏表書帝啓作甘誓，見世變也。征苗之誓惟曰：「一乃心力，其克有勳。」（大家要同心合力，才會打勝仗）甘誓則曰：「不用命，孥戮汝。」（不聽命令，我就殺你老婆孩子。）故君子謂讀甘誓則知唐虞之風微，商周之運至矣。」<sup>24)</sup> 不服者，當服之以德，今乃以戰服之；爲爭天下而戰，不用命則「孥戮汝」，其德可知。要把這兩條文字比較對看，才知道司馬遷的微意。這條表文，顯然以帝啓爲非；以帝啓爲非，則史公崇堯舜德讓之意可知。史記的十表很特別。跟其他史書中的表不同，因爲不能只拿它當資料表來看。司馬遷作表的目的是要「表天下之大勢與理亂興亡之大略，而觀一時之得失。」<sup>25)</sup> 十表首記「伐有扈，作甘誓」，正是好例證。十表之後又有八書，八書首禮。「讓者，禮之實也。」<sup>26)</sup> 無讓不成禮，故曰「禮讓」。「安上治民，莫善於禮；移風易俗，莫善於樂。」<sup>27)</sup> 八書首禮次樂，決非無義。司馬遷作八書，決不只是在講典章制度史，其目的乃在於「觀世變，通古今，究天人，有垂法後王之意。」<sup>28)</sup> 總合來看，史記五體之首都寓有貴讓崇禮、禮讓爲國之意。不但如此，史記全書隨處也可見到這種思想。<sup>29)</sup> 這也正是史記上繼春秋、下啓百代之所在。

史記一共只有七十篇列傳，要以此有限篇數記述黃帝至漢初二千五百年間的歷史人物，其事甚難。這勢必要有選擇剪裁，有選擇剪裁自然有去取之義。列傳首伯夷，是殷末周初人；次管晏，是春秋時人；次老子韓非，是春秋末戰國時人。從黃帝到殷末周初約一千五百年，僅得伯夷一傳，而此一傳所寫又實事少而議論多，且就實事部分言，讀來也若在真段有無之間。從周初至管仲約五百年無傳，其中有二百年屬春秋時代，其時封建體制日趨崩潰，但也正是古典文明漸臻爛熟之時，故名公巨卿輩出，賢士大夫史不絕書，一時不知出了多少人物，而司馬遷都不寫，獨取管晏。管晏二人都是大政治家，不乏史料，可以寫成兩篇獨立的專傳；而史公却偏將這兩個相隔一百多

22) 賈誼、「過秦論」，見史記「秦始皇本紀」贊。

23) 「太史公自序」五帝本紀條敘目。

24) 徐克范「讀三代世表補」，見「世五史補編」第一冊，p.4（開明）。

25) 見拙著『論史記五體及「太史公曰」的述與作』，p.25（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 6，1979.12）。

26) 左傳襄公十三年「君子曰：讓、禮之主也。」此言讓爲禮之實，亦前人成語，取其無讓不成禮之義，然亦難考其始。

27) 史記、禮書。

28) 全注 26，p.28。

29) 參拙著『試論司馬遷所說的「通古今之變」』第五節（沈剛伯先生八秩榮慶論文集，聯經，1976）。

年的人物合傳，並寫成一小篇，而且略其政績，群其交友，豈不可怪？

清初湯諧在「史記半解」中曾說：「列傳首伯夷，次管晏，世序故也。然伯夷叔齊所全者，君臣父子兄弟之倫，而管晏傳獨于朋友之道三致意焉。維持人紀之義備矣，作史者其有憂患乎！」<sup>30)</sup> 伯夷讓弟以遵父命是孝，兄弟相讓而逃是悌，不臣二姓是忠，管晏傳寫管鮑之交，晏子贖越石父是朋友，湯氏所言正確。但管晏傳末也寫有一段御者與其妻的故事：

晏子為齊相，出，其御之妻從門間而窺其夫。其夫為相御，擁大盆，策駟馬，意氣揚揚，甚自得世。既而歸，其妻請去。夫問其故，妻曰：「晏子長不滿六尺，身相齊國，名顯諸侯。今者，妾觀其出，志念深矣，常有以自下者。今子長八尺，乃為人僕御，然子之意自以為足，妾是以求去也。」其後夫自抑損。晏子怪而問之，御以實對，晏子薦以為大夫。

此段文字乃史公欲借御者妻口寫出晏子其人神貌，以及晏子如何察人用賢。但這段文字的實際內容，則為夫妻間的故事。家有賢妻，猶國有良相。御者幸有賢妻，故能夫以妻貴。聽諫抑損，從善改過，此其夫婦之際亦足可傳誦，立為楷模。所以，我認為「史公立伯夷、管晏二傳，實已寫徧五倫。他的目的是要在寫之中綱紀人倫，各留榜樣，垂教後世。」<sup>31)</sup> 湯氏雖於五倫中僅言其四，但末句講得極好，「維持人紀之義備矣，作史者其有憂患乎！」五倫是古往今來人間五種基本的人際關係，司馬遷乃各為舉例。像兄弟讓逃，管鮑之交這些例子，識是人倫的最高典型，具有超脫時空、垂範永久的價值；把它們寫進歷史中，足可永遠引起人類心靈的共鳴。中國文化特重人倫，這在經部、子部、集部的作品中常能反映出來，但史部著作能在寫史之中隱含此意，並用以昭示後人者，司馬遷的史記却為開山。<sup>32)</sup> 這在中國固屬罕見，就是在世界史學史上恐怕也難再找到例子。由此寫法，可見中國文化以及司馬遷史學的特色；也可證明史記並非單純的史部著作，與一般史書大不相同。

#### 四. 百王大法

以上係就史記的編次、去取、寫法等個別舉例說明司馬遷論治的思想。但史記既是通史，司馬遷似應對人類數千年的生活經驗有個總結，有一個通盤的見解。這就與他所說的「通古今之變」的思想有關。史記記載了二千多年的歷史，司馬遷自謂要在這二千多年歷史中窮極古今，曠覽時變，原始察終，見盛觀衰，最後還要探尋其「成敗興壞之理」，留給後人作為法戒。換句話說，史公的「通古今之變」，最後的目的是要「得古今之常」。<sup>33)</sup> 從史記看，古今之變莫大於周漢之際，

30) 湯諧「史記半解」第二冊，管晏列傳。(康熙乙未，慎餘堂藏板) 此書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得見。

31) 參拙著「伯夷列傳發微」pp.47-49 (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 34, 1985)。

32) 全上。

33) 徐復觀語，見「論史記」(大陸雜誌 55/5-6)。

其要有三：(一) 封建改郡縣；(二) 禮樂之論亡；(三) 儒術之污壞。仔細分析這三大變，其始都與周衰有關。周衰之徵兆，在於共和行政。共和行政，是由於厲王奔彘。厲王奔彘，是因為弭謗。弭謗，是因為惡聞已過；而厲王之過則在「好利」、「專利」。由於好利、專利，京師遂亂，亂自上始，天下遂趨於亂。司馬遷自己說：「讀春秋厲譜謀，至周厲王，未嘗不廢書而歎也！」<sup>34)</sup>公孫弘欲以利祿誘進仕途，司馬遷又於儒林傳首說：「余讀功令，至於厲王學官之路，未嘗不廢書而歎也。」又於孟荀傳首說：「余讀孟子書，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，未嘗不發書而歎也。曰：『嗟乎！利誠亂之始也。夫子罕言利者，常防其原也，故曰：放於利而行，多怨。自天子至於庶人，好利之弊，何以異哉！』」三次廢書而歎，都是為了「利」字，而且明白指出利為亂源與好利之弊。<sup>35)</sup>

好利則爭，爭的至大對象就是國與天下，而所用以爭的至大手段就是「詐」與「力」(戰與殺)。這是天下大亂與生民塗炭的根本原因，考察周衰以後至武帝時代的歷史，也足以證明。司馬遷曠觀古今，見到了為爭利以致君臣相斃，父子相殺，兄弟相滅，夫婦反目，朋友成仇的例子，不可勝數，乃說：「察其所以，皆失其本已。」<sup>36)</sup>「本」是什麼？就是「禮義」，所以他在平準書的贊中說：「以禮義防于利」。這是司馬遷論治的根本主張。好利則爭，「爭」之相反為「讓」，「利」之相反為「義」，所以司馬遷崇讓尚義。史記書中記崇讓尚義的事例頗多，其中最特出者為伯夷與吳太伯。史公把他們列為列傳與世家之首，都含有「以義細利」、「以讓化爭」、「以禮義防于利」的思想在內。崇讓尚義，則必重禮。古代言禮必及樂，二者與治道皆有不可分的密切關係。史記八書以「禮」、「樂」二篇為首，司馬遷正有深意。八書是史公的論治之言，前面說過，司馬遷作八書的目的是要「觀世變，通古今，究天人，有垂法後王之意。」「以禮義防于利」，正是司馬遷「通古今之變」之後所得的結論。(亦即「得古今之常」)這個思想並非是他個人的發明，乃有所本；本於孔子，尤其是孔子的春秋。孔子「罕言利」<sup>37)</sup>，常防其原，主張「為國以禮」<sup>38)</sup>，「見得思義」<sup>39)</sup>，又說「安上治民，莫善於禮」<sup>40)</sup>，「能以禮讓為國乎，何有？」<sup>41)</sup>司馬遷為孔子立世家。孔子弟子「崇仁厲義」<sup>42)</sup>，司馬遷為他們立「仲尼弟子列傳」。孟子、荀子「明禮義之統紀，絕惠王利端」<sup>43)</sup>，司馬遷為他們立「孟子荀卿列傳」，以明孔子之道之所傳。但司馬遷主張「以禮義防

34) 史記，「十二諸侯年表」序。

35) 全注 29，第四節。

36) 太史公自序。

37) 論語，子罕篇。

38) 論語，先進篇。

39) 此子張語，但亦可視為孔子的思想。

40) 史記、禮書。

41) 論語、里仁篇。

42) 見「太史公自序」。仲尼弟子列傳叙目。

43) 見「太史公自序」。孟子荀卿列傳叙目。

干利」，其最大的本原則在孔子的春秋。因為，「春秋者，禮義之大宗。」<sup>44)</sup> 這是史公作史大義之所本，也是史記之繼春秋處。必須認識到這個思想的脈絡，然後才能了解太史公何以在「自序」中不厭其詳地記錄了一段和壺遂談論春秋的對話。這段文字，從孔子講到春秋，從春秋講到六藝，又從六藝講回春秋，最後歸結於「禮義」，又忽然冒出一筆，由「禮義」講到「禮」與「法」的區別。「法施已然之後」，其為用易見；而「禮禁未然之前」，其所為禁者就難知了。這表示「禮」是用來預防的，乃防患於未然，制治於未亂，保邦於未危，弭亂於未形，其成效甚大却難為人和（此猶老子所云：故善戰者無赫赫之功。），然而這才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。

周衰以後，禮壞樂崩，遂有孔子出來，整理六藝作春秋，想要撥亂反正。孔子道不行，下邊從戰國到秦漢的人君，都是輕禮重法以爭利。武帝之時，漢興已百年，照司馬遷的意思，這本是賢君的一個大好機會——應當上接夏商周三代絕業（不接暴秦），重新制作一代之大法，制禮作樂。然而，武帝表面上雖然也興禮重儒，其實只是專飾鍾鼓玉帛以欺世，武帝時代的嚴刑嗜利反而超過高、惠、文、景之世，而古代的禮樂遂從此不可復見。司馬遷痛惜武帝錯失了這個千載一時的良機，以多欲侈心敗壞了文景以來長期休養生息的富裕，又恐怕重蹈暴秦的覆轍，所以他才不讓周孔五百之期，本詩書禮樂之際，正易傳，繼春秋，就上千數千年的歷史中去申明治道，從「通古今之變」中來達制治之原，最後仍寄望於後人，說：「述往事，思來者」，「俟後世聖人君子。」<sup>45)</sup> 這是司馬遷也是孔子對後世的寄望和對人類的熱愛。所以，史記不止是一部好的歷史書，它還是「百王大法」。

## 五. 結 論

史記基本上只是一部書，一部史書，但不是任何一部書或史書都可能成有必要去討論它的特殊性質。可是，史記這部史書特別，它有特殊性質。因為，它上承中國古代學術中論治的傳統，以及春秋「立一王之法」的思想和精神。它的特質就在於它是「百王大法」，不明白這點，就不算對史記有深知。司馬遷不是一般的歷史家，他有一副熱心腸；他對現世絕望却又對與己死後無關的後世懷抱急切的熱望；他有許多從千百年歷史經驗中歸納、提煉出來的肺腑之言要告訴世人，希望中國、人類將來能走上一條康莊大道；不明白這點，也不算對司馬遷有深知。

以四部的觀點來看，史記是「正史鼻祖」，應屬史部；史記是「散文大宗」，可列集部；史記「成一家之言」（諸子百家皆各成一家之言），又帶有子書的性質（此子書不過是以史書的形式出現罷了！）；現在講史記是「百王大法」，它竟有經部的血統。最早登錄史記的，是漢書藝文志。漢志把「太史公百三十篇」（史記原名「太史公」）列在「六藝略·春秋家」下，可見漢人原把它歸入經（六藝）部，視它為春秋的嫡子。以一部書而同時橫跨經史子集四部，這在中國是絕無僅

44)-45) 俱見「太史公自序」。



有的，真是一部偉大的作品。宋朝的鄭樵(A.D. 1104~1162)曾推崇史記是六經以後最偉大的作品(「六經之後，唯有此作。」<sup>46)</sup>)，確有見地。今天我們重新審視這部偉大的作品，無論是單獨就史記作研究，或拿它來和其他時空中產生的史學作品作比較時<sup>47)</sup>，都不應忽視了這部書的特質——百王大法。

46) 鄭樵、通志總序。

47) 歐西古代史著可取與史記作比較者，至少有 1. Herodotus 之 HISTORIAE (歷史)；2. Tacitus 之 ANNALES (年代記)；3. 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 之 DE VITA CAESARUM (皇帝傳)；4. Suetonius 之 DE ILLUSTRIBUS VIRIS (名士傳)；5. Plutarch 之 VITAE PARALLERAE (對比例傳，或譯為「希臘羅馬英雄傳」)。稻葉一郎『「史記」成立に關する一考察』一文(第二屆中西史學史研討會論文集，pp.273-306，久洋，1987.8)曾言及此，但未深入比較。